

- [81] 《陈锡璋为索康和西藏代表往晤尼赫鲁请助独立等情致沈宗濂电》，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七册，第 2867-2868 页。
- [82] 台湾地区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吴忠信先生日记》，1947 年 5 月 20 日，系列名称：一般档案，馆藏号：一般 230/5617.2。
- [83] 台湾地区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吴忠信先生日记》，1946 年 9 月 4 日，系列名称：一般档案，馆藏号：一般 230/5617.1。
- [84] 马明孝：《热振是怎么死的》，《西北通讯》第二卷第二期，1948 年 1 月 31 号，第 30 页。

## 【论 文】

### 近代有关“西藏问题”的文书写作与认知研究<sup>1</sup>

徐百永<sup>2</sup>

**摘要：**近代以来，西藏在西方殖民者的侵略和渗透下，成为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对于“西藏问题”，近代知识精英奋笔疾书，揭露西方殖民者对于中国西藏的渗透以及西藏之所以成为近代中国边疆治理中突出问题的原因，认为英俄等国的侵略渗透及晚清以来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的失误是造成西藏成为“问题”的主要缘由，并在此基础上，就如何解决“西藏问题”，加强对西藏地方的有效治理建言献策。相关认知对于现在中国的边疆治理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西藏；西藏问题；精英；文书写作

近代以来，在西方殖民者的持续渗透和侵略下，包括西藏在内的边疆地区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呈现出相对疏离的局面，如何解决中国的边疆危机，巩固主权，近代中国精英阶层展开了对于边疆地区内容广泛的书写，其内容不仅仅涉及边疆族群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生活环境、风俗习惯等，而且就如何解决西藏等边疆地区相对“自主”于中央政府控制之外的局面也积极进行了探索。这些文书写作大大拓展了内地社会民众对于边疆的相关认知，丰富了近代民族国家建构中边疆认知的话语和内容，对于近代中央政府处理相关问题也起到了一定的借鉴作用。

在近代边疆文书写作中，有关“西藏问题”的撰写是其中比较突出而重要的方面。近代产生的所谓“西藏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清末、民国）所包含的含义并不尽相同，但核心内容都在于近代中央政府如何排除外来列强的干扰，在建构民族国家的历程中加强对西藏的有效治理，巩固边疆和领土主权。目前学术界关于近代西藏文书写作的研究与数量繁多的民国文本相比，仍少之又少，较有代表性的论述有：简金生分析了民国时期藏人在涉藏文书写作中所展现出的西藏认知，论述了汉人知识精英在书写中对于西藏女性的“情色化想象”；李健以五本《西藏问题》著作为例，分析了“西藏”概念的涵义；朱丽双分析了民国政府派往西藏的官员对于西藏的文本

<sup>1</sup> 本文刊载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9 年第 5 期，

<sup>2</sup>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 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副研究员。



书写与想象；央珍、强俄巴·次央分析了民国时期内地人眼中的藏族妇女形象及其特征；杨黎浩阐述了内地生活的藏人对西藏有关主题的看法，等等。<sup>1</sup> 笔者以为，目前的研究中对于民国时期精英阶层的“西藏问题”书写的研究仍十分薄弱，而从近代民族国家的视野审视有关“西藏问题”的文本书写，有助于我们深入考察近代知识精英在面对愈演愈烈的“西藏问题”时所作出的积极努力。他们所呈现的文本深刻揭示出近代知识精英思考、看待以及解决“西藏问题”的基本情境。

## 一、关于“西藏问题”如何产生的文本书写

在近代之前，并不存在所谓的“西藏问题”。“内地与西藏发生关系，远者无论，其在清代统治二百余年，对内对外，领土主权，均已确定，任官驻兵，政令推行，地静人安，无所谓问题也。”<sup>2</sup> 而至清末民国时期，远处中国西南边疆的西藏在英国、俄国等西方殖民国家的侵略和渗透下，逐渐成为近代中央政府难以实施有效统治的边疆区域，演变成对今日中国的边疆治理仍在产生影响的所谓“西藏问题”。从目前可见的近代文本可知，比较早的明确将西藏与“问题”结合起来进行表述的文章，应该是1906年上海《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杂志之《英俄协商西藏问题》，以及同年《法政杂志》转载的《东京日日新闻》上发表的《西藏问题》<sup>3</sup>。此后“西藏问题”逐渐在内地报刊上频繁出现，并成为时人关注的重要主题。当然精英们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和书写在此之前已经大量涌现。

从文本来看，精英们最开始更多关注的是西方殖民者对西藏的渗透和侵略，其中英俄在西藏的角逐成为他们关注的核心问题。早在1877年，上海《万国公报》便刊文称，英国驻华官员向李鸿章提出“准英员由印度至西藏查勘路程”，英人向西藏的渗透便受到时人的关注。<sup>4</sup> 1888年隆吐山事件前后，英国和俄国已经开始显露出角逐西藏的姿态：“天下各埠西人无所不通，不通者只藏地耳。然英早欲于印度赴藏通商，而俄皇前亦派员至藏测量山川，博考物产并绘地图，以知其中款要”，并预言“中若不预为布置，恐将来或不免因之召衅也”。<sup>5</sup> 此段言论已经提醒国人，对于以英俄为主的帝国主义国家渗透西藏，如不未雨绸缪，恐导致有关西藏危机的产生。1898年《知新报》接连发表多篇有关英俄渗透西藏的文章，诸如“窥伺”“议取”“垂涎”等字眼见诸标题，<sup>6</sup> 引起了社会舆论对西藏的广泛关注。时人已经认识到，西藏者，“英国得之，则可以固印度之门户而为之屏障；俄人得之，则可以拊印度之背而扼其吭，以为高屋建瓴之势。”<sup>7</sup> 他们预言：“不出五稔，西藏其为英、俄角逐之战场矣”。<sup>8</sup> 20世纪初，“两大强国逐鹿于世界第一高原”

<sup>1</sup> 相关研究成果如：简金生的《藏人论藏：民国时期藏人的西藏观》（《台湾师大历史学报》第50期，2013年12月）和《民国时期汉人对西藏妇女的情色化想象》（《新史学》第25卷第3期，2014年9月），李健的《民国时期的“西藏”概念——从1926-1935年间的五本〈西藏问题〉著作谈起》（《西北民族研究》2012年第2期），朱丽双的《民国政府的西藏专使（1912-1949）》（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6年），央珍、强俄巴·次央的《民国时期内地人眼中的藏族妇女——以近代妇女期刊的有关刊载为例》（《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杨黎浩的《国民政府时期藏人所论藏事浅析》（《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以及成发强的《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入藏官员的西藏书写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陈向的《民国时期内地藏人有关西藏的文本书写与认知》（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杨露的《民国时期有关西藏历史地位的文本书写与认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等硕士学位论文皆可供参考。

<sup>2</sup> 孔庆宗，行宪与西藏及西藏问题[J].边政公论，1948,7（1）.

<sup>3</sup> 参见《英俄协商西藏问题》，《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1906年第225期；金葆璋译《西藏问题》，《法政杂志（东京）》1906年第1卷第6期。

<sup>4</sup> 佚名，大英国事：题及由印度至西藏通商事[J].万国公报，1877（470）.

<sup>5</sup> 佚名，大俄国探测藏地[J].万国公报，1889（11）.

<sup>6</sup> 相关的文章如《英俄窥伺西藏》（《知新报》1898年第67期）、《英人议取西藏》（《知新报》1898年第71期）、《英人垂涎西藏》（《知新报》1898年第78期）等。

<sup>7</sup> 佚名，英人侵略西藏[J].新民丛报，1903（31）.

<sup>8</sup> 佚名，俄兵入藏[J].新民丛报，1903（33）.



的态势已然形成。经历八国联军侵华及被迫签订《辛丑条约》的清王朝已经面临着西方列强“瓜分中国之严重局面”。<sup>1</sup>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政府在西藏事务处理上所存在的失误也逐渐进入精英们的视野。他们从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的视角开始反思“西藏问题”的形成，认为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的政治治理体制设计上存在缺陷，虚化了中央驻藏官员在西藏的实际权力。如1898年《论西藏弊政》一文指出，清政府在荡平廓尔喀之后，“未能布置尽善，其国政仍归于达赖、班禅两汗僧，有事商之于驻藏大臣”，“遇其所不愿行之事，必推之于三大寺众喇嘛等不允”，造成驻藏大臣难以行使权力。<sup>2</sup>他们认为，清朝“措置藏事”有“三失”：一是岳（锺琪）威信削平全藏之初，“不能悉其地而郡县之，以为一劳永逸之计”；二则在乾隆平定大小金川之后“不能移得胜之师，进临卫藏，变更戎索，悉治以汉官之威仪”；三则在于咸同之乱时，达赖借口剿贼“收三瞻诸地”，“国家多故之秋，未遑诘问”，这些造成西藏人轻视中央，“即无英、俄两国之离间，亦已飞扬跋扈，不可遏抑矣”。<sup>3</sup>显而易见，精英们惋惜于清朝没有按照内地行省郡县模式治理西藏，认为这是清末西藏出现严重危机的根本因素。

除治理体制存在不足之外，精英们还认识到中央派驻西藏的官员多乏善可陈，而且多庸碌无为之辈。“盖天下之事，无生而难者也，必其先漫无布置，无形之中，难端四伏，久之而后发难，然后天下真有不可为之事，而使人踌躇于无可如何。今日西藏之问题，非自今日始也。自雍乾时，勘定西藏，其所定驻藏大臣之权限，其精密完备，为我向来所无有，有人谓此时必有客卿为我谋者，非我之智之所及也。不意徒有其法，而无能胜其任之人，百余年间，西藏之事，如在云雾，中国士大夫，殆无人能详之者，而祸端乃见。”<sup>4</sup>除揭示出清朝治理西藏不得其人之外，也暴露出深受传统观念影响的清代精英们对于西藏相关信息缺乏了解和认知。不仅仅所派官员不堪其任，更有甚者，驻藏官员任职期间渎职、贪腐等行为进一步恶化了中央在西藏的权威和声望。1907年，袁仲指出，清朝驻藏大臣例用旗人充之，其入藏，诸处债主多随之往，赴藏者多系“穷宦”，百方罗掘，无财不取，三年瓜代，即满载而归，“藏民视之不啻虎狼蛇蝎，惟恐避之不及。”<sup>5</sup>甚至有人指出，历任驻藏大臣“率以旗员之沉滞者任之，视同远谪，方趋避之不暇，一旦任事，非鹵莽灭裂，即畏葸因循，从无喜功好名之心，安识固国殖民之法。其始不肯办事，其后遂致失权，推原其故，虽由历任大臣之溺职，亦实由朝廷之轻视此官，有以致之。又驻藏大臣，虽亦以二三品大员任之，然权势实远不如督抚，而所入至菲，又不足以资肆应，且窃朝廷之不欲事事。故尤乐于无为。在朝廷方谓如此已足羁縻，初不知空穴来风，事已坏于冥冥而不觉矣”。<sup>6</sup>清朝政府轻视西藏，视之为化外之地的“异域”，而对所派官员的素质、级别均不能满足代表中央治理西藏地方的需要。

此外，在应对西方帝国主义者对藏侵略时，清政府的手足无措、应对乏力也是重要的关注焦点。有人慨言：“呜呼！大盗伺门，已愈十载，今已入室发篋，主人乃惊顾错愕，何其见事之晚也。”<sup>5</sup>在列强的侵略下，清政府几无西藏事务主导之权，任凭列强掌控事态的发展。时人就此坦言：“吾思之不觉股慄心悸”“今日而始欲拯西藏之亡，则西藏已为英、俄之竞争点，而几无复我容喙之地”。英国等列强在西藏事务上的蛮横无理和强盗行为激起了人们心中的忧愤之情。他们批评清政府对于西藏所持有的忽视态度，称：“我得之则为石田，人得之则为腴壤。我忽之若敝

<sup>1</sup> 佚名，英国之西藏远征[J]. 浙江潮，1903(10).

<sup>2</sup> 佚名，论西藏弊政[J]. 国闻汇编：第4册，1898年1月7日；卢秀璋. 清末民初藏事资料选编[M].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1-2.

<sup>3</sup> 佚名，藏事危言[N]. 广益丛报，1909-1-1（192）.

<sup>4</sup> 佚名，论中国不宜委弃西藏[N]. 外交报，1904-4-10（73）.

<sup>5</sup> 袁仲，西藏[N]. 东京大同报，1907-8-5（2）.

<sup>6</sup> 佚名，整顿西藏条约[N]. 广益丛报，1908-7-18（175）



屣，人爱之若拱璧。如此而望其万世为我藩属，其可得耶？”<sup>[1]</sup>将西藏视为“石田”“敝屣”同样揭示出清政府及精英们在理念上对西藏认识仍处于传统观念的影响之下。

民国以后，西藏危机并未随着清朝的灭亡而消失，反而进一步造成了西藏与内地相对隔离的不正常局面，西藏成为游离于中央政府实际控制之外的边疆地域。精英们进一步探讨了西藏危机的产生问题。他们依然关注英国对“西藏问题”的出现所扮演的角色，如王履康认为，西藏之所以成为问题“乃是英国十八世纪来侵略的结果”，从光绪末叶到辛亥革命之间，“西藏问题，成了一个异常复杂的局面”，“陷入了更难解决的地步”，西姆拉会议、康藏纠纷、青藏纠纷均使得“西藏问题”更为复杂化。<sup>[2]</sup>英国利用西藏地处西陲、交通不便的地域特点，造成所谓的“西藏问题”，致使“西陲国土，大有分裂之危”。<sup>[3]</sup>英国对中国西藏的渗透是造成“西藏问题”的主要外来因素，这成为精英们的基本共识。

精英们关注更多的则是总结清末民国以来“西藏问题”的演变态势，总结中央政府处理藏事中的种种失误，相关总结更为深入。1925年8月，林毓在为朱绣《西藏六十年大事记》所写的跋中，总结认为“藏事之败坏”，“非坏于国家兵力之不足，亦无怪英人手段之狡狴也”，认为张荫棠在藏“以亲善妥协政策”“甚得藏人欢心”，而联豫“以不便于己，多方攻击，政府不辨是非”，使张去职，“自是以后，所有长官遂鲜有不僨事误国者也”；辛亥革命时川军在藏焚烧抢掠以及1917年彭日升因藏人割草“妄杀无辜”，“均足使藏人起离畔之心，而收拾益竟为难也”。<sup>[4]</sup>在其看来，中央政府治理西藏过程中失当之举措是藏事败坏的重要因素，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央政府在治理西藏事务上所派官吏的种种误国行为使得“西藏问题”愈演愈烈，而形成与中央隔离的不正常局面。长期从事藏事处理的蒋致余也持有同样的看法，他坦言：“考藏事之败坏，乃一由于有泰之措置乖方，再由于联豫之威福擅作，三由于钟颖之多端压迫勒索，而民元驻藏川军之恣意焚杀劫掠，尤为其致命之伤。时至今日，达赖及全藏民众，虽对于有泰诸人及驻藏川军，尚犹不无余愤。”<sup>[5]</sup>曾发表多篇有关西藏文章的冷亮指出，“西藏问题”的产生“半由英俄之侵略，半由边吏之昏庸”，“若无有泰之愚庸昏愤，若无川军之入藏骚扰勒索，若无联豫钟颖之相互交恶，而清廷不革除达赖喇嘛名号，藏事之败坏，定不至若是之恶劣”。<sup>[6]</sup>他们言虽有异，所举事例不尽相同，但显然都认为，中央驻藏官员、军队的失当行为及中央政府治藏失误是近代西藏危机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

除上述内容外，精英们还从更为深层次的治理观念上予以反思。1930年，白眉初指出清朝治理西藏的“放任主义”是造成西藏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认为“自清初以迄今兹，乘三百年，此为世界所共见，独可惜者，吾国政府，对藏一切治理，例取放任主义，从未积极干预，使归同化，以故西藏人民，保守千百年来传统的闭锁习惯，有如昔日，不期乾嘉之间，英人侵略印度成功，遂起而侵略西藏，不遗余力”。<sup>[7]</sup>清朝对于西藏的羁縻放任政策造成了后者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社会发展滞后，而没有实现与内地的一体化，从而为侵略西藏的英国殖民者所利用。尹扶一在《西藏纪要》一书中也认为，“西藏问题”的产生印证了“必空隙而后生风，木腐而后致蠹”的道理，坦言“无可乘之隙，则外力决无由突入，既偶触之，亦必蹶然自返矣”。<sup>[8]</sup>1948年，曾在西藏工作多年的李有义撰文犀利地指出“为什么千余年来和我们依为唇齿的边地竟没有受到中原文化的

<sup>[1]</sup>佚名，英国与西藏之交涉[N]. 江苏（东京），1903-10-20（7）。

<sup>[2]</sup>王履康，西藏问题之检讨[J]. 新中华，1934，2（18）。

<sup>[3]</sup>王洁卿，西藏问题之症结及今后根本解决之方策[J]. 边事研究，1936，3（6）。

<sup>[4]</sup>朱绣，西藏六十年大事记：跋[M]. 出版信息不详，1925。

<sup>[5]</sup>蒋致余，三十年来藏事之回顾及其解决之途径[M]. 南京：大陆印书馆印行，1932，第68页。

<sup>[6]</sup>冷亮，中央对于西藏统治权之恢复问题[J]. 边事研究，1937，6（1）。

<sup>[7]</sup>白眉初，西藏始末纪要[M]. 北平：建设图书馆，1930年第2卷第1页。

<sup>[8]</sup>尹扶一，杨耀卿. 西藏纪要[M]. 蒙藏委员会编译室印行，1930，第151页



沐浴”？他认为清代对藏政策，“一面利用宗教的麻醉，以高爵厚禄怀柔活佛喇嘛，一面则分区驻军加强军事上的控制，在文化方面则反有意的使它和内地分离。……边疆大吏都一律任用满人，而且多系宗室以防携贰，这些设施虽然加强了清廷的直接控制，在文化上反而使中原和边地益形隔离了。所以在辛亥鼎革，满清的统治推翻后，中原的势力就一扫而光，没有留下丝毫的痕迹。假定在满清统制的三百年中，稍稍注意到文化的沟通，今日也许根本没有所谓‘西藏问题’了。今日的‘西藏问题’正是在吃满清对藏政策的后果”。<sup>[1]</sup>

综合来看，西藏之所以成为“问题”，由内外多重因素共同导致。在近代精英群体的视野中，西藏成为边疆问题既是有清以来中央政府治理西藏过程中的失措之所致，也是近代英国等西方国家西藏渗透和侵略所导致的结果。

## 二、建言献策——解决“西藏问题”之途径

在近代精英群体的认知中，西藏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西藏者，吾中国地理上最占形势之领土也”；“我有西藏，我自可保我吭，而护我背。人有西藏，人遂得扼我吭，而拊我背。则我不可不经营西藏”。<sup>[2]</sup>“西藏存，实乃本部之西藩，西藏亡，而本部孤立，断无幸存之理。有西藏乃有中国，无西藏是无中国也。”<sup>[3]</sup>作为中国西部屏障的西藏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清末精英们痛心疾首地提醒国人：“若再不思对付之，彼三藏膏腴富地，宝藏高原，将真非我所能有。”<sup>[4]</sup>他们呼吁全体国民关注和关心西藏安危，共同思考如何巩固中国对于西藏之主权。对此，民国时期的精英阶层依然认识深刻。华企云就曾指出：“吾人必不可以其僻处荒徼，而不加闻问”，“良以西藏之地形，足以扼中国之吭而拊其背，以制我全国之死命焉。故吾人于西藏当以中国之西藏目之，不当以荒徼异域视之。”<sup>[5]</sup>华氏所言，揭示出当时中国虽然已经进入共和时代近二十年，而人们的思想观念却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传统治边思维之中，将西藏视为“荒徼异域”的观念也依然存在。而这种观念已经不合时宜。他们认为，对于西藏，再不应该沉浸在传统的徼外之观念视之，应该秉承的观念是西藏是中国之西藏，而并非已然脱离中国控制及与中国没有隶属关系之西藏；要认识清楚“西藏是整个中华民国的领土，西藏人民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构成份子，她的荣辱，她的存亡与整个中国前途有莫大的关系”。“西藏问题，决不是中国少数民族与多数民族的问题，而是整个世界帝国主义与整个被压迫民族的问题，同时西藏问题不独是西藏民族的前途，是整个中华民族革命及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前途，在此严重意义之下，凡属国人均有瞭解西藏问题及负有解决问题的使命。”<sup>[6]</sup>举安的这一将西藏民族与中华民族视为一体的主张与著有影响较大的《西藏问题》的陈健夫不谋而合。陈健夫认为：“西藏问题是中华民族的试金石”，“中华民族假若是要保持长久的生命的话，就要积极的把它解决，否则的话所谓中华民族不就有昙花一现的危险么？”同时指出“西藏问题是中国整个的问题”，西藏关系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国防，“不能单纯的固执着西藏而论‘西藏问题’，必定要抓牢着整个中国问题的核心再来细心探讨”。<sup>[7]</sup>

在思想意识上统一如何认识西藏地位重要性之后，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如何解决“西藏问题”。所谓“西藏问题”，民国时期其所包含的内容与清末有所不同，清末偏重于如何加强对西藏

[1] 李有义，西藏问题之分析[J]. 边政公论, 1948, 7(3).

[2] 荣升，经营蒙藏以保存中国论(上)[J]. 东京：大同报, 1908(7).

[3] 佚名，筹藏私议[N]. 广益丛报, 1908-6-28(173).

[4] 袁仲，西藏[N]. 东京大同报, 1907-8-5(2).

[5] 华企云，西藏问题[M]. 上海：大东书局, 1930, 第244-245页.

[6] 举安，英人侵略西藏之探讨[J]. 康藏前锋, 1934(8).

[7] 陈健夫，西藏问题[M].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7. 第139-145页.



的治理。而民国时期，西藏形成了与内地相对隔离的局面，具有从中国分离出去的潜在危险。冷亮曾指出：“何谓西藏问题？分析言之，曰班禅回藏问题，曰康藏划界问题，曰中央在西藏统治权之恢复问题；而尤以后者为诸般问题之核心，换言之，前者为枝节问题，后者为基本问题，前者为局部事件，后者为整个办法。故中央在西藏统治权之恢复与否，乃判断西藏为我国领土与否之条件。”<sup>1</sup> 因此，如何恢复对西藏的统治权已经成为时人思考“西藏问题”解决办法的核心。

具体而言，精英们所提的解决方案无非武力解决和平解决两种，或者二者综合运用。著有《西藏问题》的王勤培认为应该诉诸武力“镇服”，认为此为解决“西藏问题”的釜底抽薪之策，即“合川滇甘三省之兵力，先镇服川边之藏番，此目前切要之图”。<sup>[2]</sup>来自西康，任职于蒙藏委员会藏事处、曾担任《蒙藏周报》副主编的格桑泽仁在《康藏概况报告》一书中，认为解决西藏问题之办法：“纯用和平，则不足以戡达赖及其左右之野心，而使其觉悟就范，纯用武力逼迫，又恐其挺而走险，惟一办法，即先用武力以挫其锋，继之以和平而求德化，除中央通盘严密计划准备外，无论军事和议，均由有关系之川滇青各省合力会商应付。”<sup>[3]</sup>他甚至在《解决西藏问题意见书》中还主张以西康省政府为解决藏案之“主体机关”，征集全康民兵，参加川军组织护法军，“命班禅进驻西康担任护法军总司令之名义，以资号召，则名正言顺，事无不成，政府只须饷械之援助”。<sup>[4]</sup>举安也主张：“解决西藏问题治标方法是要有武装的准备，必要时用武力规复故土”。<sup>5</sup>

除武力解决办法之外，1929年，格桑泽仁还提出了和平办法：“为今之计，政府宜选一熟谙藏情且复与藏方稍有关系之人任为宣慰使，直接派至西藏。其路不宜由印度前往，因恐受英人掣肘而破坏进行，必须不辞辛劳，取道西康，沿途与康藏人民竭力宣传主义，到藏之后，与达赖及一班新派，详解地理历史上之关系，痛说利害，再细指帝国主义之罪恶，中国国民革命之意义，何谓三民主义，何谓五权宪法，使之一一了解之后，伊必增一番觉悟，自不难接受宣慰之旨，过去之事概不追究。”<sup>6</sup>蒋致余也认为中央对于西藏“无非欲扶植弱小，团结种族，实行总理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自决自治之遗训，成立整个中华民族，一致对外，以求三民主义之实现，并无歧视达赖与全藏民众之心，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无一不可以至诚相见，在此中央已派员赴藏宣达中央德意，达赖又派有代表来京陈述西藏情况之后，西藏对于中央，已发生直接关系，关于西藏之一切纠纷，无一而不可以与达赖代表直接讨论。”<sup>7</sup>蒋致余对当时主张诉诸武力手段的观点予以了批评，认为：“听从一般无识者武力解决之主张，是直自掘坟墓，非至断送西藏不可，故余于未论解决藏事方法之先，敢大声疾呼曰，国人如欲谋西藏问题之解决，应先于和平中寻其途径，非至万不得已时，不可遽启兵戎也。”他指出：“武力征服，一时不易实现，即使无内忧外患之顾虑，实行征服政策，又谁敢保其不影响西陲边防乎，更谁敢保其不牵动国际交涉乎，且西藏处于万山重叠之中，形势险峻，交通阻隔，兼以地瘠民贫，知识未启，兵连祸结，疾苦已深，劳师袭远，胜负既未可前知，而百孔千疮，干戈尤不宜再动，”认为徒使压力于其身只会增加藏人之反感，而主张采取怀柔手段“以攻其心”，才是“应取之解决办法”。蒋致余进而指出：武力解决“西藏问题”“自历史上，地理上，国家内政外交上，西藏宗教政治上，观察之，实事倍而功半，害多而利少”。<sup>8</sup>太虚同样认为武力解决“动非数万万允不可”，损失破坏“更不可计算”，“加

<sup>1</sup> 冷亮. 中央对于西藏统治权之恢复问题[J]. 边事研究, 1937, 6 (1)

<sup>[2]</sup> 王勤培, 西藏问题[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9.

<sup>[3]</sup> 格桑泽仁, 康藏概况报告[M]. 出版信息不详, 1932, 第45-46页.

<sup>[4]</sup> 格桑泽仁, 解决西藏问题意见书[J]. 蒙藏委员会公报, 1929 (1/2).

<sup>5</sup> 举安. 英人侵略西藏之探讨[J]. 康藏前锋, 1934 (8).

<sup>6</sup> 格桑泽仁. 解决西藏问题意见书[J]. 蒙藏委员会公报, 1929 (1/2)

<sup>7</sup> 蒋致余. 三十年来藏事之回顾及其解决之途径[M]. 南京: 大陆印书馆印行, 1932, 第68-69页.

<sup>8</sup> 参见蒋致余, 《三十年来藏事之回顾及其解决之途径》, 南京大陆印书馆印行, 1932年, 第68页。蒋致余随黄慕松到西藏致祭和册封十三世达赖喇嘛后, 其对“西藏问题”的认识进一步加深, 而不再坚持和平解决“西藏



以艰难困阻，尤不知得何结果”，而主张中枢及康青官长与西藏僧界高僧协商解决。<sup>1</sup>

在外交方面，对于与“西藏问题”形成有直接关系的英国，王勤埭主张“坚持继续民国三年悬案之讨论，而置其他草约以及停战条约于不顾，此与英国开议中藏界址问题之方针”，通过与英国协商确定内地与西藏之边界，并主张“一方联合印度民族，积极从事于民族自决运动，一方又援助印度之自治与独立，以根本破坏英帝国主义在亚东侵略之大本营，此解决西藏问题之治本方策”。<sup>2</sup> 举安也认为“西藏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对英国的交涉：“解决西藏问题要以英人为主要对象，过去中国政府应付西藏问题咸昧于问题的真际，多视为国内民族间的纠纷，或视为宗教上的争执，因此屡用所谓和平的敷衍政策，以至西藏问题陷于如此的严重。”主张“此后我仍以祖国的资格与英人交涉，对于全盘交涉绝对不能丝毫放松，于领土主权更不能丝毫迁就”。<sup>3</sup> 王文萱认为，与西藏恢复“一向关系”之前，应向英国宣明态度，在“相当程度下维持英人之利益”，“俾减中藏关系恢复之阻力”，并坦言：“此非妥协，盖审度事实，谈藏事，不能舍英，若徒作动听高远之论，与事何补哉？”<sup>4</sup> 熟知西藏事务的蒋致余并不认同在解决西藏事务中与英国进行交涉的做法，他主张与西藏地方政府直接交涉，“今者英国已未干涉我中央与藏人直接解决西藏问题，殊不知国人何为而欲牵涉英国？”<sup>5</sup> 冷亮也认为：“解决藏事应以西藏地方政府为交涉之对象”，“西藏事件为我国内政问题，而非外交问题”，并批评前清和北京政府在处理西藏事务上与英国协商的行为“属绝大谬误”，因而主张“今欲谋藏事之解决，吾人应始终保持直接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万不可再蹈以前北京政府之覆辙，而与英国交涉也。”<sup>6</sup>

精英们有关“西藏问题”的解决建议中，强调国人应该从思想上高度认识到西藏具有极端重要的战略地位，关系整个中国与中华民族的存亡与发展。“西藏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中央政府对于和平还是武力手段的抉择，也有赖于中央政府妥善处理英国的外来干涉。

### 三、统治西藏之方策——民族国家建构视野下的西藏治理书写

早在清末，对于如何加强对于西藏的统治和治理，知识阶层便提出了许多建议，其中已经部分包含着民族国家建构的基本理念，显示出从传统王朝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变过程中中国人边疆治理观念的演变。1904年《拉萨条约》签订前后，清朝上至政府官员，下至普通知识阶层，对西藏的关注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如时人所言：“近年以来，举朝野上下，全国之视线，胥注于卫藏之一隅，人人攘臂而言藏事，或曰设行省也，或曰筑路也，或曰开矿也，或曰兴屯垦也，聆其言非不令人慨然有封狼居胥之意，实则一物无所见，而一步不可行”。<sup>7</sup> 此言虽然在于批评时人在谈如何经营西藏事务上的纸上谈兵，但也透露出清末时人提出加强西藏治理的忧国忧民之心态。1910年，曾任西藏帮办大臣的温宗尧上奏清廷“维持西藏大局折”中指出，今日中国治藏“实大有可为之机”，“但须迅速、敏活，急起直追，而后可为，且需分别表里，善为操纵。在内之计划，则当兼程并进，不可无一日千里之心；在外之形迹，则当镇静、和平，不可无应付弥缝之术，不必遽改西藏之地为行省，而不可不以治行省之道治之；不必强西藏之俗同汉民，则不

问题”，转而赞成动用武力。参见喜饶尼玛、荣加林，《民国驻藏官员蒋致余评述》，《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第65-67页。

<sup>1</sup> 太虚，西藏问题之适当解决[J]. 文化先锋, 1934,2(15).

<sup>2</sup> 王勤埭. 西藏问题[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9 第 107-108 页。

<sup>3</sup> 举安. 英人侵略西藏之探讨[J]. 康藏前锋, 1934 (8) .

<sup>4</sup> 王文萱, 筹藏刍言[J]. 开发西北, 1934,2(1).

<sup>5</sup> 蒋致余. 三十年来藏事之回顾及其解决之途径[M]. 南京: 大陆印书馆印行, 1932. 第 70 页。

<sup>6</sup> 冷亮. 中央对于西藏统治权之恢复问题[J]. 边事研究, 1937, 6 (1)

<sup>7</sup> 佚名. 藏事危言[N]. 广益丛报, 1909-1-1 (192) .



可不以爱汉民之心爱之。”<sup>1</sup> 温宗尧主张对于西藏事务应该急起速图，不重形式而重实质上对于西藏实行行省郡县制度的管理，借以强化对西藏的治理。在清末诸多加强中央政府对西藏治理的措施中，将西藏改建为行省，或以行省之道治理西藏成为时人主张的核心观点。他们主张保持当时的驻藏大臣体制，使其总揽外交、军事、财政等大权，“宜使之便宜行事，其威望权力与督抚等，政府不为遥制，匪第特加崇衔已也。前后藏事，均归管理……其达赖喇嘛，只准总理教务，一切行政，不得过问。”<sup>2</sup> 而清末西藏新政中，清政府已经这一思路纳入到西藏事务的管理模式中。然而将西藏改建为行省并未及得以实践，“西藏改建行省之议，前清腾诸舆论，见之奏章，卒未见诸施行”。<sup>3</sup>

辛亥革命之后，西藏在政治上呈现出与中央政府若即若离的局面，“西藏问题”依然存在，甚至愈演愈烈，精英们在考虑如何解决“西藏问题”的同时，在民族国家的建构之中，如何能够有效地治理和统合西藏，也成为关注的重要问题。“西藏问题假若一天是解决的话，那么以后的西藏究应用什么方策去统治？这个问题我们尤须恳切注意。因为我们解决西藏问题的目标是在恢复统治权实行革新政策。”<sup>4</sup> 无论确立各种政策，将西藏地区改建为行省是民国时期学者们所提出的解决“西藏问题”的重要意见之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将西藏建为行省的主张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华企云指出：“关于康藏建设行省之事，自来建议者，已不一其人。良以西康为川滇各省之屏蔽，而西藏则又中国本部之藩篱也。比来边疆各地，其为特别区域者，已逐渐改为行省。西藏于英，势尤岌岌”。<sup>5</sup> 他引述格桑泽仁和宫敦扎西所提交的“康藏设省建议书”之“康藏分别改为三个行省之建议案”，认为西藏“实有即刻建省之必要。”<sup>6</sup> 陈健夫则指出：“西藏建省尚非其时。”西藏建省自然是好事，“但事实上，现在是不可能的，目前所能做到的是一种预备工作，即是使中央与西藏的关系密切，无论政治与经济皆能趋于接近，预备工作成功以后，西藏建省是不成问题的，现在高谈建省，著者未敢苟同。”<sup>7</sup> 陈健夫并非不认同即刻将西藏改建为行省，而是认为在当时时机尚未成熟，“西藏问题”尚未解决之前，建省不宜实践。在其所讲的预备工作中，整理西藏政务、实现政教分立也是建省的必备条件。<sup>8</sup> 华企云同样认为，“西藏问题”解决之后，“宜将西藏改为行省”，“实为吾人当然之职分”。<sup>9</sup> 徐位主张，中央在西藏设立驻藏长官，代表中央办理藏事务，同时指导藏人办理外交；认为在中央与西藏关系“初复之际”，“应付之宽严缓急，稍不得宜，即足债事，”建议遴选威望素著，洞悉世界大事的干员“方能胜任”。<sup>10</sup> 在此过程中，要在西藏推行政教分离，政教应分立而治，达赖、班禅只管宗教，政治则由中央委任官吏治理<sup>11</sup>。按照行省制度的模式改造西藏是精英们所认为的加强中央对藏治理的一致观点。

此外，在近代精英看来，西藏远处边陲，“隔绝内地”，原有可通的驿道已经“逐渐梗塞”，致使内地文化“无由灌入”，“中央政教威德无由昭示，启藏人藐视之心，无形中自成一国，要之不外因交通梗塞所致”。<sup>12</sup> 交通的“阻梗”对于解决“西藏问题”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西藏问题，数十年来，在外交上情形复杂，危机暗伏，在内政上和战皆非，应付乏术。推其原故，无非因交

<sup>1</sup> 佚名，卸任驻藏帮办大臣温咨请赵代奏维持西藏大局折（宣统二年六月十二日）[J].外交报，1910（289）。

<sup>2</sup> 佚名，整顿西藏条议[N].广益丛报，1908-7-18（175）

<sup>3</sup> 达生，经营西藏之借箸[J].说报，1914（10）。

<sup>4</sup> 陈健夫，西藏问题[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sup>5</sup> 华企云，西藏问题[M].上海：大东书局，1930，第155页。

<sup>6</sup> 华企云，西藏问题[M].上海：大东书局，1930，第160页。

<sup>7</sup> 陈健夫，西藏问题[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第169页。

<sup>8</sup> 陈健夫，西藏问题[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第195页。

<sup>9</sup> 华企云，西藏问题[M].上海：大东书局，1930，第245页。

<sup>10</sup> 徐位，西藏问题之解剖与今后解决之途径[J].外交评论，1933(3)。

<sup>11</sup> 王洁卿，西藏问题之症结及今后根本解决之方策[J].边事研究，1936，3（6）。

<sup>12</sup> 司徒澄，统治西藏问题[J].康藏前锋，1934,2(1)。





通阻梗所致。”<sup>1</sup>精英们还以印度至西藏的交通便利造成英国控制西藏政治经济为例，说明发展交通的必要性。“试观印藏间之交通，大吉岭以南，铁路已通。印边至江孜汽车道已修，所以今日西藏之政治经济，尽受制于英人之手。”“返观中藏间交通，犹是数千百年前之状况，相形见绌，能无憬然。”<sup>2</sup>中国内地与西藏交通不便相对于英国经略印度、开拓印藏交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认为这种差异造成了英国在西藏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解决藏事应把发展交通作为先决条件。王勤堉在著作中指出：“西藏问题之棘手，西藏人民之智识幼稚，实为一重要原因”，而提高其智识程度“当先谋西藏交通之便利”。<sup>3</sup>王洁卿提出的“根本方策”中也认为，解决“西藏问题”的“根本方策”是首先是发展交通，改变内地与西藏交通不便的局面。<sup>4</sup>在此前后，黄慕松在拉萨时，西藏地方政府泽墨噶伦曾告诉他：“英国国势强大，通藏交通便利，一旦藏英有事，英军两周内兵力可抵拉萨，即使中央帮忙，增援部队，但交通阻滞，至快非三个月不能到拉萨。”<sup>5</sup>对此，黄慕松深有感触，其对从内地经康区前往西藏的道路情况有很深的体会。在对藏政策中，他主张：“由中央与西藏合组建设委员会，筹划开发交通事业。在短期内应注意完成拉萨玉树间、拉萨康定间、拉萨成都间与青海间之航空联络，其他汽车公路，循序渐进。”<sup>6</sup>由此看来，发展西藏交通成为巩固中央对西藏治理具有根本性价值的事务。

精英们还清楚地认识到，教育是化解汉藏隔阂，融洽民族关系的重要途径，认为有必要在西藏推行边疆教育，普及国文国语，灌输同属一国的国家观念和意识，从而实现“化特殊为相同”的目的，而达到塑造国民，构筑统一国家政治认同的终极目标。举安认为：“解决西藏问题要发展西藏教育，灌输西藏民族的国家思想和民族观念”，实现西藏与内地的文化、思想观念的趋同，进而寻求汉藏民族以及“整个中华民族之团结”<sup>7</sup>。王洁卿认为“西藏问题”之治本方法“尤在励行普及教育，灌输内地文化，先求语言文字之统一。然后消灭种族成见，以产同一之国家观点”，“西藏问题不消灭而自消灭矣”。<sup>8</sup>“盖惟言语文字相同，然后对国家方能产生同一之观念，同一之信仰；我汉藏间之风俗习惯既异，言语文字，又复不同，故其产生同一之国家观念，团结一致，以御外侮，不亦难乎？”<sup>9</sup>从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视野出发，精英们认为追求语言文字风俗等的“同一”是加强国家统一的重要途径。同时，精英们还主张应该加强西藏与内地的文化沟通。黄慕松自拉萨返回后所提的建议中，主张“在拉萨筹办一种汉藏合印定期刊物，以沟通感情，传递消息，介绍内地文化与中央施政方针”<sup>10</sup>，从而拉近西藏与内地民众之间的心理距离。李有义也认为，解决“西藏问题”，谋求对西藏的长久治理，应着重于“文化之沟通”，武力手段仅是必要时可用作“前奏曲”，“百年大计则仍须赖文化之沟通，满清之错误即在未作文化之努力”，“只有文化之沟通方能加强国族之团结，此当为吾人建设边疆之中心工作”。<sup>11</sup>

以上总结了精英们对西藏加强政治整合，实行有效统治的基本路径，除上述之外，他们还主张要发展内地与西藏之经济贸易，尊崇西藏佛教等。精英们的对策建议中渗透着浓厚的民族国家建构的基本理念，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对于人们思考边疆治理，建构整个国家的主权意识和疆域理念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sup>1</sup> 徐位. 西藏问题之解剖与今后解决之途径[J]. 外交评论, 193,3(3).

<sup>2</sup> 徐位. 西藏问题之解剖与今后解决之途径[J]. 外交评论, 193,3(3).

<sup>3</sup> 王勤堉. 西藏问题[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9, 第117页.

<sup>4</sup> 王洁卿. 西藏问题之症结及今后根本解决之方策[J]. 边事研究, 1936, 3(6).

<sup>5</sup> 佚名. 英人侵略西藏[J]. 新民丛报, 1903(31), 第112页.

<sup>6</sup>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M].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3, 第113页.

<sup>7</sup> 举安. 英人侵略西藏之探讨[J]. 康藏前锋, 1934(8).

<sup>8</sup> 王洁卿. 西藏问题之症结及今后根本解决之方策[J]. 边事研究, 1936, 3(6).

<sup>9</sup> 王勤堉. 西藏问题[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9, 第107-108页.

<sup>10</sup>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M].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3, 第113页.

<sup>11</sup> 李有义. 西藏问题之分析[J]. 边政公论, 1948, 7(3).



## 小结

精英群体有关“西藏问题”的认知和书写，揭示出近代中国从传统王朝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国人传统观念向近代理念的转变轨迹。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从实际操作层面来说，从传统王朝国家到近代民族国家的构建，本身包含着近代中国人一种世界意识的产生。这种意识的产生或出于被动回应或得益于对近代西方思想的解读，不管怎样，从边疆经营层面来说，它唤起了此期社会舆论和民众对边疆问题的关注，亦为此期边疆问题的合理解读提供了另一种阐述话语”。<sup>[1]</sup>有关“西藏问题”的文本书写同样遵循和体现了这一逻辑。

近代以来，精英群体有关“西藏问题”的相关著述为内地社会了解和认知西藏，总结西藏治理中的经验和教训，解决“西藏问题”，提供了视角广泛、内容丰富的参照资料。这些文本书写“凡所引证，悉凭典籍。推原索委，聊抒所见”，希望达到使时人“俾知藏事关系边防，既如此重要，而纠纷情形，又异常复杂，苟能知往鉴来，惩前毖后，不视为一隅之利害，而以全国之力，切实经营，则亡羊补牢，未为晚也”的基本目标，彰显出近代精英群体继承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文本书写的经世致用之基本脉络，通过自己的文本书写，为中央政府的西藏治理提供借鉴，希望“政府当局放远目光，亟起而图之”。<sup>[2]</sup>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本书写均有意无意地遵循着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理念展开，这是近代精英群体对西藏等边疆进行文本书写的基本情境，而且相关文本为近代中央政府的西藏治理也的确起到了一定的资鉴作用，客观上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对于中国边疆问题的理解和认知，对于我们深入思考近代以来的“西藏问题”，进而促进当代中国的边疆治理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近代知识精英关注备至的所谓“西藏问题”在西藏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之后已经全部解决。而当今中国所面临的“西藏问题”已经从包含历史、政治和法律内容的所谓“西藏独立”问题，扩展到涵盖西藏人权、宗教和文化的诸多议题，演变成西方反华势力牵制中国发展和分化中国的重要主题。<sup>[3]</sup>现在的所谓“西藏问题”“根本不是什么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和人权问题，而是西方反华势力企图遏制中国、分裂中国、妖魔化中国的问题”。<sup>[4]</sup>这是当代中国知识阶层需要面对和积极探索破解之道的时代使命。

<sup>[1]</sup> 邹明洪、冯建勇，从传统天下到近代国家：清季近代国家观念之构筑——兼论民族国家构筑视野下的中国边疆[J].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10 (10) .

<sup>[2]</sup> 徐位. 西藏问题之解剖与今后解决之途径[J]. 外交评论, 1933 (3).

<sup>[3]</sup> 李学保、金飞雪，“西藏问题”国际化及应对策略分析[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8 (2) .

<sup>[4]</sup>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政府西藏白皮书汇编[G]. 人民出版社，2010，第37页。

